

彻底否定 “文化大革命”讲话

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

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

彻 底 否 定 “文 化 大 革 命” 讲 话

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

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讲话
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 编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零一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印张：8.25·字数：192,000字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01—170000册

统一书号：3349·036 定价：1.40元

说 明

军委和总政领导同志指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新兵一入伍就要进行这一教育。要编写教材、宣传材料和参考材料。为此，我们根据总政治部宣传部的指示编写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讲话》一书，作为连队战士教材。

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

目 录

第一讲：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必要性

和重要意义 (1)

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党和人民经过斗争

取得的伟大胜利 (2)

二、整党和改革的实践反映出进行彻底否定“文化

大革命”教育的必要性 (9)

三、总结和吸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对

每个同志都必要 (18)

四、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是正面教育 (25)

第二讲：“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28)

一、“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 (28)

二、“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中党内“左”的错误的

产生和发展 (32)

三、发生失误的主要原因 (61)

第三讲：“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64)

一、“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64)

二、“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 (70)

三、“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 (85)

四、“文化大革命”的第三阶段 (96)

五、“文化大革命”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的

主要原因 (106)

第四讲：“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111)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	(112)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	(120)
三、发生理论错误的症结	(131)
第五讲：“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136)
一、“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136)
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	(139)
三、“文化大革命”毫无可以肯定之处	(160)
第六讲：联系实际，彻底否定“文革”遗风，肃清流毒和影响	(170)
一、彻底否定“突出政治”	(170)
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推行的“左”的经济理论和政策	(182)
三、彻底否定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所谓“全面专政”	(199)
四、彻底否定和消除派性	(212)
五、彻底否定“大民主”	(217)
六、彻底否定“大批判”	(225)
第七讲：正确认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231)
一、实事求是地、历史地对待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	(231)
二、认真总结和吸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248)
后记	(256)

第一讲

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 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违反了党、国家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已经被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彻底否定了。但在全党普遍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是一九八四年四、五月间在军队的整党内搞起来的。党中央肯定了这个教育，此后在连队和地方也普遍开展起来。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同志指出：“对‘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和流毒绝不能低估，从高级干部到一般战士，不论是不是参加过‘文化大革命’，都有必要从思想上认真清理。我们在整党内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的。”^①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同志指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不仅对于老同志、中年同志很有必要，对于没有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轻同志也很有必要，是当前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教育。”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同志也指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仅关系到整党各项任务的完成，而且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与长治久安。”^②为什么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如此重要呢？这是应该首先认

① 《军队整党第一年》第69页。

② 《人民日报》1984年12月22日。

识清楚的一个大问题。

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党和人民经过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出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悲剧——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已经判明，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由于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了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愿，因此一开始就遭到党内外大多数同志的抵制。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承认，“文化大革命”遇到了阻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这种情况说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并没有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他们对搞“文化大革命”是不理解的，是反对的。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威望，由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党内的“左”倾错误缺乏认识，加上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煽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并没有能够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以后，党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次又一次地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了努力和斗争。

一九六七年的“二月抗争”，就是党中央内部一批老同志为

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而进行的第一次努力和斗争。虽然这次斗争被当作所谓“二月逆流”打下去了，但是，这次斗争发生在党中央政治局内部，它向全党、全国人民表明了党内一批老革命家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

一九七一年，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之后，周恩来同志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了艰苦的努力。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周恩来同志以此为转机，在批林整风中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提出要对经济进行整顿，要落实干部政策、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抗争”中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周恩来同志的正确主张无疑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遭到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抗。毛泽东同志又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左”。这样，在一九七三年底又发动了反对所谓“右倾回潮”的运动，目的在于维护“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同志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作的努力受到了挫折。

一九七五年初，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了巨大的努力和坚定不移的斗争。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不久，毛泽东同志要他主持搞一个文件肯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同志以“桃花源中人，不了解情况”为由婉拒了。他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果断地提出和着手对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他还两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不久，“四人帮”借评《水浒》之机，进行反扑。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

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旨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同志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的努力和斗争受到了暂时的挫折。但是，邓小平同志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正义行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内乱”之中看到了希望、受到了启发，重新思考、认识“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重大是非问题，加速了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四人帮”反革命真面目的认识，终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场运动矛头直指“四人帮”，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是党内外广大群众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总爆发，说明“文化大革命”已经丧尽人心，人民已经不能容忍“文化大革命”再进行下去了，不容许“四人帮”再横行下去了。这场抗议运动的实质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四人帮”，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按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没有问题的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那么简单。十月的胜利虽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不等于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当时党和人民仍然面临着两种选择，两个前途：一种是彻底否定和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使党的路线回到马列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这种选择和前途是党和广大人民所希望的；另一种是继续沿袭“文化大革命”一套错误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使党和国家长期处在“天下大乱”之中，这种选择是“文化大革命”的得利者、造反起家的人、打砸抢分子所

希望的。在两种选择、两种前途面前，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违背广大党员和人民的意愿，作了第二种选择。他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其实质就是要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要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他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反对及时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他阻挠平反“文化大革命”制造的冤假错案，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不顾邓小平等同志们的劝阻，在十一大报告中坚持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口号；他甚至宣称：“‘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显然，由华国锋同志来领导否定“文化大革命”，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以邓小平同志为杰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同华国锋同志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七七年初，华国锋同志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一出来，邓小平同志就表示反对，指出：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五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尖锐地指出，搞“两个凡是”不行，这个问题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個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①七月他在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他的领导职务时第一次正式讲话中再次指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后来，他又尖锐地指出过：“‘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

① 《邓小平文选》第35页。

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①他同党内其他同志一道坚决地支持和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这场大讨论，问题之尖锐，社会影响之大，可以说是延安整风之后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胡耀邦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说：这场讨论的意义，十分重大，“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邓小平同志对这场讨论也给了高度的评价，他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②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摧毁了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解放了思想，促使人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去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这就从思想上摧毁了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支柱，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明确提出否定“文化大革命”问题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这次会议上，党内许多老

① 《邓小平文选》第262页。

② 《邓小平文选》262页。

同志提出了怎样总结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胡耀邦同志在西北组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丰富，教训深刻，要很好总结。现在全党和人民群众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林彪、‘四人帮’，为什么在台上搞了十年，根本教训是什么？”不少同志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要认真总结。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要分清楚。不然心有余悸的问题解决不了”。会议从当时的情况出发，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适当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是必要的，但不应匆忙地进行，这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一九七九年国庆前夕，党召开十一届四中全会，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突破十一次代表大会的限制，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初步的研究，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同志在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使“我国人民遭到了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这是党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评价。十一月，党中央为了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重大问题作出正确的决议，总结历史经验，决定组织一个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小组，来研究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若干历史问题。

一九八〇年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根据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意愿，在认真复查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纠正了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在事实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所谓的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心内容。这是彻底否定“文

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

一九八〇年十月，根据党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全党四千名高级干部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讨论，特别对“文化大革命”作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分析，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历史上的一场最严重的灾难，其理论和实践都是完全错误的。讨论中许多同志针对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口号的错误，提出调整他所担负的领导职务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接受了这些意见，先后九次召开会议，讨论华国锋同志的功过问题，并作出决议：建议六中全会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这样不但从思想上而且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为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决议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九八一年六月，党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历史决议》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实践和结果，作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历史决议》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一部分首先原文引证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接着对这些论点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批判，从根本上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彻底否定，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

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在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历史决议》作出的这些论断，总的精神是，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完全错误的，不是革命的，不是社会进步，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它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的只是损失、破坏、混乱和倒退，必须彻底否定，决不允许在中国重演这种历史的悲剧。

《历史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是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实践结果，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的正确结论，是党和广大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是拨乱反正的结果。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十分必要的。如果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党的指导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拨乱反正就不可能深入进行，党就不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创新，开拓前进。

二、整党和改革的实践反映出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必要性

既然“文化大革命”作为历史已经过去了八年多时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那么，今天为什么还要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呢？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解放军战士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这不是当作一般的

政治教育，而是从整党和进行改革的实际出发，作出的一项带全局性、关键性的决定。

首先，对党员和干部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是在整党中提出来的，是全面完成整党任务的关键。党中央所以决定要整党，说到底，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了我们党在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虽然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批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在拨乱反正、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中，都不同程度地在思想、作风、组织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流毒进行了清理，但是还来不及对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许多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整顿。对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教育还进行得不普遍、不充分。“文化大革命”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因此，这次整党开始后，一接触实质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的东西就冒出来，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表现之一，是一些党员、干部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存在各种模糊认识。有的同志根本不知道《历史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次整党中，党中央重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问题，有的同志还认为是新观点、新精神。我军有些新人伍的战士甚至不知道有《历史决议》。有的同志虽然从总体上、原则上同意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仍有保留，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问题，特别是对跟自己有直接牵连的问题，则另眼相看，不是这还可取，就是那也不错。有些同志对于“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是错的，错在那里，还懵懵懂懂，孰是孰非并不清楚。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虽有严重错误，但起到了“反修防修”作用。有的说，“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应该承认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功绩。有的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一分为二，彻底否定

“文化大革命”是否违背一分为二的观点？有的说，“文化大革命”反对官僚主义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有的说，“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们建成了长江大桥，卫星上了天，工农业生产也有发展，能说“文化大革命”一点好处也没有吗？有的同志耽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否定这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会不会否定了毛主席，等等。据某省对一些单位的党员进行的调查，有上述模糊认识的约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由于认识上的糊涂，有的同志仍然继续使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理论、口号和做法。一九八四年某省党校大专班招生考试，有人竟把早已被否定了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当成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写进了答案。一九八四年九月，某大学中文系党总支发出的学生政审调查表，竟要求回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十一次路线斗争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直系亲属及主要社会关系中有无重大问题？属何性质？有无右派？”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某县新华书店到一九八〇年十月还在使用“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委员会”售书章。有的城镇甚至还保留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旧标语，等等。这些都说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肃清其流毒和影响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表现之二，一些同志不能正确认识“三支两军”和“工宣队”。一些参加过“三支两军”的同志有“支左有功”的思想，看成绩多，看问题少。有的认为，自己当时是“奉命行事”，自己没有什么错。有些参加过“工宣队”的同志，认为工人进驻大学，是“无产阶级的光荣”，“工宣队领导学校理所当然”。一九六八年，进驻杭州大学地理系的某些人，在地理系大搞“活人展览”，七位老教师被当作“牛鬼蛇神活靶子”在“展览馆”展出，用极端侮辱人格的办法丑化教师。系里五十八名教职工中有二